

劉授松文學論集



刘绶松文学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乐秀镐

封面题字：戴一峰

刘缓松文学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14,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增

书号：10078·3346 定价：0.90元

序

我同刘绶松同志没有见过面，但心仪已久，早在五十年代，我就读过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是一部具有科学性的严谨的著作。就当时来说，在这部现代文学史中涉及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

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他的遗作重新编辑出版《刘绶松文学论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有机会读了这部遗作的样稿，特别是读了《编后记》写的一些事实，颇引起了一些感慨，关于作者和这部遗著的遭遇，不是也反映了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在那股“左”的思潮下的命运么！

原来这部论文集早在一九六六年已经由作者本人编好了，但是一场风暴，不仅使这部著作不得不搁置下来，而且更为令人不平的是作者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竟使这样一位勤勤恳恳努力治学，始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严谨的学者，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被迫含冤死去。那些自称“革命”的好汉们对他进行了“毁灭性”的抄家，致使他的全部手稿、讲义、书籍等等全部抄灭，只字无存。而这部遗稿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它没有放在作者的手中，当时是由出版社保存下来了。

当我读着这部幸存的遗稿的时候，越发感到它的珍贵了。

至于那些自称“革命”实际上是毁灭文化的好汉们，如果还有一点点人的良知，又能否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点自我谴责，作一点自我反省呢？

刘绶松同志是我国近代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从事文学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九年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之外，他还出版过两本论文集：《文学散论》和《京郊集》。

这部文集主要由两部分论文组成。一部分是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包括对鲁迅和茅盾的创作的研究，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论述。一部分是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对于后学者理解这部古典文论，大有裨益。

这里还包括了他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中的深刻体会和取得的宝贵经验，如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和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作者在《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旗帜》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对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作者认为，我国过去遗留下来的大量文学作品中，真正能作为优秀遗产为我们所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东西，所占比例到底不是很大的，例如《全唐诗》近五万首，作者有二千余人，但真正能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代表唐诗高度成就而留传下来的为数就不多了。作者认为面对如此

丰富的文学遗产，一方面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重新加以检验和评价。另一方面又必须认真对待，他认为大量的虽还没有被认为是优秀的遗产接受下来，“但从文学史工作者看来，它们也仍然是必须掌握的资料”，因为“作为优秀遗产来接受，同作为文献资料来研究，这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应当区分开来的”。刘绶松同志提出的这一见解，对治文学史的人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他在论文中阐述了文学遗产中许多作品具有不同的作用，不能划一来要求。因为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家的优秀作品总会反映出矛盾的现象，不应过分苛求，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而过去时代的有些作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特别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有着不少可供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在另一篇论文《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问题》中，他认为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就是“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还没有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这个问题提得好，也确实是摆在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正如他在论文中所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还很少同志进行系统的研究。这八十年的文学史还可说是一块荒芜的园地，迫切需要我们去努力开垦。”（顺便说一下，关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确如作者所说还停留在“一块荒芜的园地”上。六十年代初有些大学的编写组开始了这项工作，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是否能比较客观地来从事文学史的研究，似还难说。能否历

史地看待文学的历史，也还很需要认真地进行总结。)至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虽比较多一些，但队伍还不大，特别是“应该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应该重点深入研究的作家作品和重大的理论问题还多得很”。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队伍的问题，一是资料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工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支理论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经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主要是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大都是大学教师的讲稿，这种现象对于文学理论工作的不能有所提高是关键所在。另一个问题，对于资料的整理和积累工作，非常薄弱。全国图书馆对各地的报纸、期刊和图书的收藏和积累是很差的，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版的主要报刊，都很难找得齐全，这又如何能为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作者提供足够的资料呢？缺乏资料就谈不上什么研究。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和作品，总是那么十几个、几十个，几乎是有那么一个框框，一个规格，我想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大量资料的掌握，远的不说，“五四”以来的作家和作品为数都不算少，但能列入文学史的实在是寥寥可数。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阐述了对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些精辟的观点，可惜的是作者未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而过早地被一伙自称“革命”的毁灭文化的家伙扼杀了。而且那伙人把他几十年研究工作中积累下来的全部手稿、笔记统统抄没毁弃了。这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

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他的心愿：“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工作是到了迫切需要展开的时候了。让我们文学史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积极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吧。”

这段话，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的遗言，也是鼓舞我们年轻一代的文学史研究者继续着前辈的脚步，作出应有贡献的一个号召。

罗 苏

目 录

序	罗 苏 (1)
读毛主席诗词	(1)
鲁迅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16)
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28)
读《彷徨》中的三篇小说	(41)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54)
鲁迅后期杂文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	(76)
读鲁迅诗一首	(92)
论茅盾的《蚀》和《虹》	(98)
论《子夜》	(128)
论茅盾的创作	(170)
论闻一多的诗	(184)
刘勰论文学批评	(194)
《文心雕龙》初探	(204)
飞腾吧，想象的翅膀	
——读《文心雕龙·神思》	(249)

古典文学理论中关于风格问题的论述	(260)
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旗帜	
——谈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272)
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问题	(281)
附录 怀念爸爸	刘嘉宜 (299)
编后记	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孙党伯执笔) (308)

读毛主席诗词

一九五七年一月，《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席旧体诗词十八首和毛主席写给《诗刊》编者臧克家等的一封信。在我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这是一桩大事。它给了我国诗歌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同时又为诗人们创作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提供了卓越的典范。

毛主席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诗歌上有关新诗和旧体诗词的关系的深刻见解。无论对诗歌运动或诗歌创作来说，毛主席这个深刻见解都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毛主席的某些诗词（例如《沁园春·雪》）在它正式发表之前就已在人民口头上广泛流传，并为广大人民所十分珍爱。这个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毛主席既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又是中国伟大的革命诗人。毛主席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峰上，气势磅礴地高歌出了中国人民最美好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他的诗词来自人民生活和心灵的深处。人们从毛主席的诗词中可以亲切地接触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领袖

和革命诗人的伟大的形象。

毛主席的诗词已发表的数量不多，但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作了真实的艺术的反映。读毛主席的诗词，我们可以重温一下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一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我们试按创作时间先后作如下的排比：《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二首写作时间不易确定，可能作于大革命前后①；《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四首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斗争中；《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等七首作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沁园春·雪》作于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四首，还有后来发表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则都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我们将这些诗词从头诵读一遍，就不难窥见近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辉历程。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毛主席的诗词真正具有了“诗史”的价值。

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毛主席的诗词中，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描绘是同抒写共产主义巨人的伟大胸怀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民的诗人，而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洞察历史和现实的伟大革命领袖，他把所有一切都献给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所以当他抒写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真实感受的时候，往往能

① 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最初发表时，未注明写作年月，这里系推测之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毛主席诗词》已附注写作时间。

够把眼前的景物同革命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把革命斗争中暂时的艰苦和未来的胜利远景结合起来。这样，就使得他的为数不多的诗词，能够更真实地显示出时代的精神，并达到了前人诗篇所从未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登黄鹤楼有感而作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毛主席诗词中较早的一首。登高赋诗，原是我国诗歌中常见的一类题目，但以这样开阔的境界来抒写胸臆的，却不多见。词的上阙：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是写登黄鹤楼所见的景物。诗人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在黄鹤楼畔的周围，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无限开阔的画境。他写了流经东西的长江，写了贯穿南北的铁路，然后再写到隔江对峙的龟、蛇二山，由远及近，把祖国壮丽的河山描画在纸上。“登泰山而小天下”，眼界的开阔，正是由于襟怀的远大。

但是我们丝毫不能忽视，诗人描写周围景物，是倾注了他自己对于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之情的。在诗人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苦难的深渊里。时时不忘改变祖国命运的诗人，当他登高望远时，他的情感就不能不发生强烈的激动。因此，他笔下的景物，也就不可能不带上时代的特征。诗人没有用具有开朗色彩的字眼来描画他周围的景物，而是用了象“茫茫”、“沉沉”、“莽苍苍”一类的字眼。这些字眼一方面很适合

描写眼前烟雨迷蒙的景象，而对当时祖国的境况也十分贴切。景中有情，正好把下阙勾连起来：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醉滔滔，
心潮逐浪高！

这里的“心潮”既不是追怀往事，也不是凭吊古人，而是要改变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心潮逐浪高”，这五个字该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这样，我们从这首词里就很清晰地看见了一个跟祖国人民共命运的伟大革命领袖的崇高的形象，而受到深深的感动。

另一首小令《如梦令·元旦》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时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初几年里。这时候，蒋介石的血腥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征服、杀绝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他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领导下，高举起革命的红旗，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所领导的红军向赣南和闽西进发，创立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如梦令·元旦》这首小词便是中国工农红军向闽西进军时的一幅艺术写照。

宁化、清流、归化，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短短的六行诗，为我们构成了一幅意境鲜明、气象万千的画图。创业不易，革命原是艰苦的事业。前两行描写的，是行军宁化、清流、归化三县境内的情况。“路隘林深苔滑”，写山路的难行，但也写出了革命队伍的不畏艰险。诗句的连贯而急驰的节奏，表现了长途行军的神速。下面两句是紧跟着上面而来的：队伍并没有停顿下来，在元旦这一天，他们就要开到武夷山下。“直指”二字，把红军所向无前、无攻不克的气势很圆满地传达了出来。用字十分精粹。结尾两行，是已到武夷山下的景象。“风展红旗如画”，以鲜明的形象写出了日益壮大的红军的声威，写出了长途行军的胜利的喜悦。我们不仅从词的完整、和谐、生动的艺术描画获得美感的享受，同时也可以从它对于革命斗争的真实反映，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另一首具有很浓厚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词，是咏昆仑的《念奴娇·昆仑》。它把我们带进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代。它以诗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描画与奇特奔放的幻想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来开拓我们的眼界，激发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美好愿望。诗的开头：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便把峻高严寒的昆仑山描画出来了。“横空出世”写山的高；“阅尽人间春色”写山的年代的久远。没有宇宙永恒、人生短促的感慨，也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你只会惊奇，怎么在短短的两句诗里，竟能够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给这座名山以这样概括又形象的刻画。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这两句，更把“群山飞舞、一片皆白”的景象生动地搬到纸上来 了。拿无数玉龙飞舞来形容冰封雪盖的群山，虽然用的是前人诗意，但是推陈出新，其中有着诗人自己的创造。

描写自然景物的奇丽，并不能最后决定一首诗的不朽的艺术生命。诗人如果缺乏崇高的生活理想，不能站在更高的思想境界来观赏他眼前的景物，他的作品就会显得平淡无奇，不会唤起读者强烈的激动；只有当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民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作品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毛主席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试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就会感到，当诗人站在岷山高峰上远望时，他的思想感情一直通向了人民的心灵深处。他想起了，当夏天山上冰雪融化，长江黄河的水就要泛滥起来，而人民就要遭受灾难了。水流下来可以灌溉，这是一桩好事，但洪水成灾也是一桩坏处。但是，从古以来，有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评论过昆仑的功和罪呢！这种感慨，是非常深沉的。这里面包含了诗人当时对于处在水深火热的生活里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关怀。正是这种思想情感，产生了词的强大艺术生命。

但是，这首词最动人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在词的下阙里，我们接触到了诗人的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奇特的想象，和更为浓烈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它叫人读了眉飞色舞，意气风发。这种思想和艺术的力量，在文学史上真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